

廣州地方史文集

GUANGZHOU DIFANGSHI WENJI



第一輯

5.51

廣州市地方史學會
廣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 合編
廣 州 博 物 館

660/75

K286.51
2
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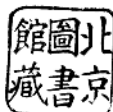
广州研究文辑·历史类之一

广州地方史文集

第一辑

广州市地方史学会
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合编
广州博物馆

一九八四年四月



B 089842

下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搞好地方史的研究。

研究广州的地方史，历来有不少专家学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广州市地方史学会的成立，必将推动地方史研究工作的的发展。我想，必须考虑广州的特点所在，如历史悠久；是著名的港口城市，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发达；是一座花城城市，近、现代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广州，许多重要人物在广州活动过；华侨对广州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以为，在历史上起过正面或反面作用的事件和人物，也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解放以来，广州作为华南经济、文化中心，社会主义祖国的南大门，一直起着重大的作用。对广州史的编著和研究，从学术探讨及普及工作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方面的工作目前还是比较薄弱的。广州地方史研究的成果愈多，将愈有利于广州通史的编写，对于全国史学也是十分有用的。

编印《广州研究文辑》说明

一、广州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南方名城，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卓有成效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就必须对广州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的研究，把广州的情况弄明白。我们编印《广州研究文辑》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二、广州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如要追溯上去，历史将更加久远。因此，古今中外研究广州的专著以及论文、资料等，是十分丰富的。本《文辑》的任务是把散藏于各种经、史、子、集、类书、丛书、野史、笔记、游记……以及报章、杂志中有关广州的记载（包括资料），按部类编印成书，如：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军事、社情民俗、人物、名胜古迹……等。在每部类之内，再分成各种专题的印册。因此，本《文辑》未能按历史顺序编印。这里开列的书号（如“历史类之一”，），仅仅是本《文辑》编印先后的序号，没有其他意思。

三、编入《文辑》“历史类之一”——《广州地方史文集》（第一辑）一书的文章，主要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广州市地方史学会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暨学会成立大会的论文和文章。

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一九八四年四月

序 言

杜襟书

广州市地方史学会将部分史学论文编印出版，这在历史学界来说，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我希望以后能继续出版下去，以繁荣地方史研究工作。

今天全国人民都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工作，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有人以为，研究历史对建国好象无补于事。我想，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不懂得昨天和前天，那么，对今天的面目也是若明若暗的。我们要学习和研究历史，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使我们懂得，马克思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说明了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总是沿着客观规律前进的，因此，马克思推翻了那种认为社会历史可以依照长官意志（或政府意志）随便改变的观点，从而把历史置于科学基础之上。这一道理对于我们是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尤其是对那些不顾历史的客观规律发展、企图用自己的个人意志改变历史的人们，势必要受到历史辩证法的惩罚。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是为了创造今天和明天的历史。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马列主义的应用，必须养成这样的好学风，我们应该很好地坚持

目 录

序言

.....杜襟南

汉代的番禺

——广州秦汉考古举要.....麦英豪 黎 金(1)

广州是我国最早的对外贸易港

——再论广州港市的形成.....邓端本(24)

康有为论朱熹在中国学术源流中的地位

.....陈慧道 伍锡强(33)

试论刘永福晚年在广州的反帝爱国活动

.....杨万秀 吴志辉(50)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农讲所的创办及其历史功绩

.....陈登贵(72)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为建立和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所作的贡献

.....黎显衡(105)

广州的“五·卅一”运动

.....黄义祥(118)

广州市地史方学会名誉会长、顾问和第一

届理事会名单(132)

汉代的番禺

——广州秦汉考古举要

麦英豪 黎金

广州，古称番禺。三国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始分交州为交、广二州，广州由此得名。从古番禺到今天的广州，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这一地区一直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秦始皇统一岭南开始，番禺在史籍上才有较多的提及，主要见诸《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越传》中，其他还是比较零散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开展，广州市郊发现了许多汉墓，还有一些重要遗址，出土大批历史文物，为研究广州古代史提供了实物资料。本文试图通过这些考古发现，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汉代番禺历史文化的某些侧面，作一概略的描述。

一、最早的番禺城

广州建城始于何时？旧志记载最早的有所谓楚庭与南武城两说。前者说的是西周夷王八年（公元前887年），楚子熊渠伐扬越，南海事楚，有楚庭（或作亭）；后者说的是战国后期周赧王时，楚灭越（公元前314年之后）^{（1）}，越人子孙避入始兴，散于岭外（或说越人公师隅为越相）修南

武城⁽²⁾。这两说因其年代较早，常被征引作为广州建城已有二千八百多年的史料根据。其实在阮元的《广东通志》中早已指出这两条旧志资料不可靠⁽³⁾，光绪四年重修的《广州府志》对此更断言是“向壁虚造，不足为据”。

城市的兴起是建立在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的基础上。据目前考古材料所知，在广州市区及近郊还未发现过先秦时期的城址。如果说西周或战国时期，广州已经作为一个城市的面貌出现，是超越历史发展的。秦平南越，在岭南地区推行郡县制，番禺开始置县，属南海郡。番禺一名始于何时，有谓《山海经》中有“贲禺”一词，贲禺即番禺⁽⁴⁾，确否，可存一说。不过最迟在汉初成书的《淮南子》、《史记》中，已多处提到番禺。秦时首任南海尉的任嚣认为“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地理位置及形势均好，就把郡治设在番禺。有州郡则有城池，任嚣修筑的番禺城（后来又被称为任嚣城），可以认为是广州古代最早的城市。赵佗建南越国，以番禺城作都城，因此番禺城既是南海郡的郡治，又是王国的都城，成了三位一体，番禺的地位日益重要。

关于汉代的番禺城座落位置，直接的文献史料不多，除了《史记·南越列传》，“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⁵⁾这一条之外，同书《西南夷列传》载，唐蒙在南越食到四川产的枸酱，“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犍柯，犍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又同书《南越列传》记武帝元鼎六年楼船将军杨仆攻南越事：先陷寻陕，破石门，顺流而下直抵番禺；建德、吕嘉皆城守。楼船从东南，伏波从西北攻城，“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表明番禺城址位于石门

东南，珠江之滨。东汉末年，步骘为交州刺史，他来到南海，见到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敞博渺目”^{〔6〕}（汉代的珠江河面宽阔，致使步骘有负山带“海”的感觉），是膏腴之地，决定把州治迁到番禺来。上述几条史料说明，番禺城的位置，就在石门的增埗河东南面，面临珠江，背倚越秀、白云二山，这处地方即今天的广州市所在。考古发现材料更能给我们提供进一步考查研究的依据。最近三十年来，在广州市区及近郊先后发掘了近八百座汉墓，这些汉墓的分布情况，对于探索早期城垣的位置，城市的发展，也是一个可靠而有用的材料。广州市中心地区的地形，北为越秀山所阻，南有珠江河之隔，成一东西狭长地带。在这里若以今天北京路以东，仓边路以西为中心，就目前所知，西汉早期墓的分布在这个中心地区西边最近点是解放北路广东迎宾馆，东边是烈士陵园的红花岗，东西相距约2公里^{〔7〕}。这个中心区应即汉初的番禺城所在，其最近的红花岗和解放北路作为葬地，在当日应是附郭之野。上述的中心区就是北宋初年的子城——广州城所在，后来，在子城东增筑东城，发现了一座土城，据说是赵佗的故城，周回十里，似较可信^{〔8〕}。1973年在越华路与广仁路交界处发现了一段呈南北走向的砖城基址。经考证是宋代子城的西城墙，由此，宋城的座落，找到了一点准确的座标。令人高兴的是，1975年在中山四路儿童公园及其东邻的市文化局内，今地表五米以下发现了秦汉的造船遗址，在船台遗址的上层揭出了一段作工极其讲究的南越王国宫署的砖石走道，走道上留有曾经大火烧毁的迹象，可与《南越传》中关于杨仆攻入番禺城“纵火烧城”的记载相印证^{〔9〕}。1976年又在这个船台遗址西面相距约500米处

(即今中山五路北京服装店位置)发现一处东汉造船遗址,这个遗址也是在今地表五米以下,同样是建造在灰黑色的河滩淤积层之上的。这两处发现,不但可以证实南越国都城的座落位置;而且还告诉我们,从古番禺到今天的广州,城区中心一直没有变动,只是日渐扩展。前代的被后代的打破与压叠着一代一代的古迹与遗物,都掩埋在今天的城区之下,是不容易发现出来的。

二、王国都城与南海郡治

番禺自秦平南越置县,经历两汉四百余年,先后经过初置郡县,王国都城,又回复为郡县的三个阶段。这期间,政治情况变化很大,这一点在考古上亦有所反映。

1、初郡阶段(始皇三十三年秦置南海郡至秦二世三年秦王朝灭亡)

秦汉以前,百越族的一支南越族居处在今广东境内,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社会结构已进入“各有君长”⁽¹⁰⁾的阶段。有的学者根据《史记·吴起列传》有“南平百越”一语,推而广之,断为战国初年楚的政治统治势力已到达今天的两广境内,岭南的越人已“臣服于楚”。《吴起传》的“南平百越”事,不能记入吴起的账上⁽¹¹⁾。公元前222年又有王翦“南征百越之君”的事⁽¹²⁾。无论“南平百越”也好,“南征百越”也好,“百越”只是越族的统称,问题的关键在“南”字,这个“南”是否往南伸展很远,已包括岭南在内呢?其实《史记·王翦列传》及同书《始皇本纪》二十五年所载王翦降越君事⁽¹³⁾指的是荆江南地的百越(即原来吴越的江浙之地),无论从事件、人物与

地理位置都与岭南无涉。至于《后汉书·南蛮列传》：“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这个苍梧的地理位置应为“舜崩于苍梧之野”的九嶷，为当日楚之南境，与汉武帝元鼎六年置的苍梧郡（治广信，即今广西之梧州）无关。若从考古方面考查，秦汉以前，岭南地区受楚文化的影响很深，这是事实，但受影响与政治上的直接统治是两回事。在岭南地区直到今天还未发现过一座楚墓，就以最容易发现的贸易媒介物——货币来说，楚的金币、铜币，甚至墓中随葬用的泥质楚币也未有见过，这不能解释为一般的偶然的现象，应视为当时楚的政治势力还未有深入到岭南地区。

番禺在秦统一岭南后，社会历史发展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对这个地方的发展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被选定为南海郡的郡治。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从秦王朝开始，番禺一直不失为岭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最大都会。一九五二年，广州石头岗秦墓出土一件盖面烙印“蕃禺”二字的漆盒，就是这个初郡阶段的历史物证^{〔1〕}。岭南在秦时划分为三郡，到汉武帝时扩大为九郡，番禺在岭南诸郡中的位置与作用能历久不衰，是有它特殊的政治、地理等条件的。二是大批中原汉人“落籍”番禺。这是番禺赢得很快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原因。秦平南越是调动了五十万“楼船之士”为五军，分五条路线踰岭后由水路开进岭南的。虽然对其中某条路线的具体地点，学者们一直存有不同的意见，但三军入广东，两军入广西似没有疑问。从湘桂接境处进入广西的两军与西瓯越遭遇，初时秦军损兵折将，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相持数年之久；入广东的三军，并没有遇到很大的抵抗，特别是《淮南子·人间训》说：“一军处番禺之都”，

似乎一下子就直插珠江三角洲的战略要地——番禺，这里扼守东、西、北三江汇流的要冲。战事结束，五军留戍岭南，与越人“杂处”。五军戍边既是巩固边疆的需要，同时也是开发这个地方的需要。处番禺之郡的一军，就地在番禺留戍，是顺理成章的，何况它还是郡治的要地哩。一九七五年在广州市区中心发现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出土许多三棱铜镞，还有兵器残件，船场的工匠无疑的主要来自秦军。一九六二年广州螺岗秦墓出土“十四年属邦”戈，还有一九七四年广西平乐银山岭4号墓出土的“江鱼”戈和同墓地采集的“孱陵”矛，都是典型的秦国兵器，这二戈一矛应为秦统一岭南战争的遗物。尤为有趣的是，浮雕动物纹样的鎏金铜牌饰，是典型的战国至秦汉年间匈奴族的文物，这种铜牌已先后三次出于广州的秦汉墓中⁽¹⁵⁾，也许可以说明在“南平百越”的秦军将士中，也有“北却匈奴”的猛将，这些战利品随着主人南征而留在遥远边郡的番禺。

2、王国都城（南越国建立至武帝元鼎六年南越国灭亡）

秦末，任嚣病死，赵佗为南海尉。在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赵佗绝新道，杀秦吏，并击了相邻的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都番禺。这个阶段的时间相当长，共九十多年，在番禺古代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考古上对王国都城亦有较多的反映。比如上面已提到的造船遗址上层揭出的一段砖石走道，这是第一次发现南越王宫建筑的遗存。应为赵佗自号南越武帝，乘黄屋左纛时期的宫署遗迹。走道上出有涂朱的“万岁”瓦当，打印“公”、“官”、“卢”等文字戳印的绳纹筒瓦、板瓦，砖质窗棂，

徐朱、绿色的砖雕脊饰等建筑残件⁽¹⁶⁾。南越王的宫殿虽然尚未发现，从地形考察，可能位于砖石走道的东北端，即清代城隍庙或其附近处。其次是发现了多处南越王国官吏的墓群，主要分布在东北郊和西北郊，位于城区东北面的有华侨新村、淘金坑、二望岗、动物园麻鹰岗等地点，这些墓群的发现与番禺作为王国都城的位置是相一致的。它有如下一些特点：墓群所在往往是十数座至百数十座同时期墓分布在一起，西汉中期以至东汉年间的墓很少有掺杂在内；其次是，大墓、中小墓各有分处，大墓比较分散，几座大墓同位于一个岗头的甚少，华侨新村、淘金坑两处均以中小型墓为主，应属王国中的中小官吏的墓葬。二望岗、流花桥、柳园岗几处几乎尽是小墓，大部分只有一、二件，多者或十来件陶器随葬，墓主大概只是一般小吏，有的可能是平民。墓中出土的印章都是私章而无官印。如“梁奋”、“臣奋”、“得之”、“臣之”、“赵望之”、“臣望之”、“臣辛”等，随葬的陶器常常打印有官署的戳印，如“居室”、“长秋居室”、“食官”、“大厨”、“常御”等。从这些陶文结合《南越传》所记，证明南越王国的百官制度是仿效汉廷的；第三是《南越传》载，赵佗耄结箕踞，与越人杂处。墓葬中亦反映出汉越民族与文化的融合共存关系。至今还未发现南越人的专门墓地，只是有少数带腰坑的墓，随葬器物尽属地方特色的器形，墓主应为南越人。但在更多的墓中是中原汉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器物同出，这些墓的主人除汉人外，亦应有南越人；第四是，南越国前期之墓，一般规模不大，随葬物不多，这和当时“新造未集”的创始阶段是符合的。到文、景以后，经过六、七十年的开发经营，墓的规模大，随

葬器物也丰富多了。

南越立国初期与汉廷的关系是微妙的，到吕后时，因对南越实行生产资料的禁运，引起双方的关系十分紧张，赵佗“发兵威边”汉廷派隆虑侯周灶回击。马王堆第三号墓出土一张《驻军图》，该图在长沙国南部边境绘有“周都尉军”“徐都尉军”“司马得军”等几支大军的分布情况，反映了当时汉越经过兵刃相接之后的紧张关系。

3、复为郡县（汉武帝元鼎六年至东汉末年）

南越国灭亡，汉朝中央政府对岭南的统治加强了。《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十月，得吕嘉首，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番禺又回复为汉廷的郡县。大概在武帝以前，有关番禺的文献史料还是比较多的，在平南越至三国吴这一段，史志中就很少见到有关番禺的资料了。据《广东通志》载，“汉平南越，改筑番禺县城于郡南六十里，为南海郡治”。到三国吴时，交州刺史步骘于建安二十二年把州治从苍梧郡的广信“移治番禺，筑立城郭”。依此说来，南海郡的政治中心有三百二十八年南移六十里去了，照方位计算，相当于今天番禺县政府所在的市桥镇或其邻近的沙湾镇这个地方。这条材料是否可信？是有待研究的。第一，所谓“改筑番禺县城于郡南六十里”，是什么地方？没有说明白，在两汉的史籍上也未见记载。若以今广州为中心，其周围六十里之外，还没有一处曾作过三百余年郡治的县城遗址及西汉中期以后的墓群发现。今番禺县的市桥、沙湾地方，据当地族谱所载，是到宋代才开发的。第二，汉平南越时“纵火烧城”，是整个番禺城烧光，还是只烧了赵氏王室的一些宫

室？汉平南越后这个地方用来干什么，荒废了三百年吗？第三，从近三十年的考古发现考查，情况也并非如此。广州发现的西汉中期墓比之当时邻近郡县的要多。当然，广州发掘的汉墓仍以南越王国时期的为多，但西汉中期（即南越国灭亡后）的墓也不少，也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墓发现。这些西汉中期的大墓，论规模虽不及南越国后期的大，随葬器物也不若以前的丰富，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同一地点前后所处的政治历史条件不同所致。前者为都城，墓主有的是朝官，有的是贵戚之属；后者回复为郡县，墓主身份等级最高也不过是地方郡守、郡尉而已。广州两汉五期墓葬的埋葬时间紧相衔接，并无突然衰落或中断的情况存在。因而可以认为汉平南越以后，番禺仍是南海郡的治所，“郡治南移”之说难以置信。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考古现象是，广州的西汉晚期墓和东汉初年墓，无论墓的形制、规模、出土的大部份随葬器物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有的确实难以划分。这个情况与当日番禺的政治形势是非常相一致的。西汉后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到王莽末年各地人民起义的烽火蔓延，北方广大地区兵燹连年，人民流离失所。这个时期岭南地区交趾诸郡实行闭境自守，南北暂时隔绝，至建武时，岑彭与邓让书后，始通贡献^{〔37〕}。西汉末年岭南闭关自守，避免了战火的破坏，地方官吏也逃避了人民起义的惩处，没有受到什么打击，所以他们死后，同样是厚葬成风。因此，广州西汉后期墓与东汉初年墓基本一致的现象实非偶然。

东汉政权是在南阳豪强集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东汉一朝，豪强势力日益发展，土地不断集中，阶级矛盾尖

锐，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地方豪右纷纷拥兵割据，到东汉末年已处于不可收拾的境地。广州东汉建初以后的大砖墓往往有城堡模型随葬，说明远离中原的边陲地区，强宗豪右拥兵割据的现象同样存在。

三、汉代番禺的物质文化

番禺在汉代是边远的郡县，秦汉以前经济、文化的发展远比中原落后。自秦统一以后，中原汉人大批南移，戍边开发，汉越民族和文化取得较快的融合，本地区有优良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汉一代这里很少有战事发生，社会比较安定。这些都为岭南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与商业交通贸易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经过两汉四百年的经营，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创造出较高的物质文明，较快地赶上全国发展的步伐。这方面在广州汉墓考古亦可得见一二。

1、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

在广州远郊已发现多处先秦的古文化遗址，从出土的各种石器工具及印纹陶器来看，当时的农业生产仍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阶段。秦统一岭南后，南越地区已用铁农具与牛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金、铁田器、马、牛、羊”，主要仰给于中原。《史记·南越列传》已有明确的记载。水牛，是珠江三角洲水田犁耕的主要耕畜，在广东新石器时期至汉代的遗址中都有发现，但广州汉墓出土的陶牛金属黄牛，也许当日的耕牛就是从北方输入的黄牛。铁农具在广州汉墓发现尚少，就整个广东地区而言，亦大致相同。始兴战国遗址出过铁锸一件⁽¹⁸⁾，广

州汉墓出过几件铁锄，⁽¹⁹⁾，其他农具未见，表明当时番禺的铁农具确实珍贵。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西汉初年墓出土木质《东阳田器志》，还有一块木牋，记载着锄、铤等农具百数十件⁽²⁰⁾，这是墓中陪葬农器的一份象征性清单，但也反映出大量铁农具已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史实。

曾经在洛阳做过议郎晚年回到家乡（广州南郊河南）归隐的东汉人杨孚，写了一本《异物志》，记载岭南当时有“夏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的双季稻⁽²¹⁾。广州和佛山澜石的东汉后期墓都出土有田埂整齐的水田模型，尤其是澜石汉墓的水田附艇模型，塑出收割，一人犁耕、施肥、插秧等田间劳动，描绘了珠江三角洲水稻耕作中“双夏”（夏收夏种）的繁忙景象。

当日番禺的农业生产已十分重视施肥，这一点从广州汉墓出土的陶屋得到说明。出土的陶屋毫无例外的在屋内设有厕所，还辟出一个地方来饲养禽畜。后院通常作猪栏，屋后的一侧或两侧有个小间用作厕所或羊圈。家禽家畜实行圈养，屋内设厕所，反映出当时十分注重积聚人粪尿与厩肥以肥田，增加作物的产量。

墓中出土的农作物种实，作为主粮的有稻、黍，在一座东汉初年墓出土的一件釉陶提甬，盖有墨书“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的题书，器内盛着半甬高粱，说明当时已用高粱酿酒。其他蔬果之类，出土有橄榄、梅、酸枣、人面子和花椒等。据载：汉武帝“平百越为园圃⁽²²⁾”，贵县罗泊湾一号西汉初年墓还出土有芋、黄瓜、甜瓜、木瓜、西瓜、葫芦、以及花椒、金盏花，还有桃、李、桔子、橄榄、梅、人面子等多种水果。贵县在汉代称布山县，是郁林郡治。上述